

全球化与中国国内劳动力流动：新趋势与政策含义

王德文 蔡 昉 高文书

摘要：民工荒现象是对中国加入 WTO 之后出口高速增长、新一轮经济增长和经济重心转移的一个劳动力市场反映。这种现象不仅标志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过渡，而且也说明需要利用全国劳动力市场来解决当前的结构性和区域性问题。实行产业梯度转移，为缓解劳动成本上升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负面影响提供了可能性。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对于提高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及其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全球化、民工荒、劳动力流动、经济重心

从 2004 年春天开始，媒体相继报道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了农民工短缺。例如，英国的《经济学人》在 2004 年 10 月 9—15 日期中报道，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有 1900 万农民工，但仍面临着 200 万劳动力短缺。到 2005 年，劳动力短缺现象进一步加剧，波及面从珠江三角洲蔓延到长江三角洲、华北沿海地区，甚至在劳务输出大省湖南、江西等地，企业也都同样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

从用工短缺的对象看，主要是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招收年龄在 18 至 25 岁的年轻女工，以及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存在严重困难（劳动和社会保障课题组，2004）。另据广东省企业调查队 2005 年春季调查显示，广东省虽然有 1/3 企业通过提高工资待遇来解决用工短缺问题，但全省用工短缺仍然超过 100 万人。在调查的 503 家企业中，有招工计划的企业占 57.1%。其中有半数企业反映招工不足。在实际招收的工人中，普通工人完成计划比例为 73.2%，而技术工人完成计划的比例仅为 58.6%，两者相差为 14.6 个百分点。

我们认为，民工荒现象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过渡的一个转折性标志。这种现象是中国加入 WTO 之后出口高速增长和新一轮经济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激烈的市场竞争改变了中国地区之间的相对优势。在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长重心发生了相对转移，并逐步形成了多个增长中心的格局。随着内陆地区在经济上快速追赶沿海地区，内陆地区非农就业机会上升和低劳动成本优势，有可能伴随产业转移加剧了沿海地区用工短缺的结构性矛盾。从资源配置角度看，这种新趋势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劳动力供求角度对民工荒现象的本质做了分析。第二部分剖析了地区竞争与流动局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讨论了产业梯度转移的劳动力市场条件。最后讨论了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含义。

一、民工荒现象的本质

民工荒现象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力市场供求问题。解释这个现象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它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出现、而不是在此前出现？（2）它是一个总量问题，还是一

个结构问题？（3）它是一个区域性问題，还是一个普遍性问題？第一个问題指出在讨论民工荒现象之前，我们需要把握它发生的背景和此前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后面两个问題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区域性问題既可能是数量问題，也可能是结构问題，对整体形势的影响有限。但全国水平的总量问題和结构问題，都属于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題，需要利用较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一）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就业形势

在短短不到 10 年时间内，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从排斥到争夺的两种截然不同待遇。在 20 世纪 90 年中期到下半年，为了缓解严峻的就业形势，保护城市职工，当时不少城市都出台过歧视农民工就业的政策规定（Solinger, 1999）。但是，随着近年来城市就业形势好转，这些政策规定大多被废除。

就发生时间而言，民工荒现象与中国对外贸易环境变化有着直接联系。中国在 2001 年底正式成为 WTO 成员，贸易条件改变所带来的释放效应使得出口贸易激增，出口增长率由 2001 年的 6.8% 上升到 2004 年的 35.4%。这种增长主要来自加工贸易出口和外资企业出口（见表 1）。中国国际贸易地位也发生了改变，2004 年中国对外贸易占全球贸易份额的 12.4%，在全球贸易中仅列在美国、德国之后，处于第 3 位。

表 1 2001-2004 年出口增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

年份	出口	加工贸易出口	外资企业出口	GDP	第二产业就业	制造业就业	第三产业就业
2001	6.8	7.1	11.6	7.2	0.4	-1.1	2.0
2002	22.3	22.0	27.6	8.9	-3.1	0.8	4.3
2003	34.6	34.4	41.4	10.0	1.9	14.1	3.4
2004	35.4	35.7	40.9	9.5	5.2	7.6	5.5

注：制造业就业数量为城镇制造业就业的年底数量，资料来自中经专网。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4），《2005 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出口迅猛增长不仅为劳动密集型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而且通过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也为服务业部门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在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双重拉动下，中国非农产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的就业在 2002 年之后出现较快增长势头（见表 1），城市就业形势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图 1 中求人倍率显示了相同的劳动力市场态势。求人倍率等于职位空缺数量与求职人数量之比。如果求人倍率大于 1，说明劳动力市场比较松弛，空缺职位数量较多；如果求人倍率小于 1，说明劳动力市场比较紧张，职位空缺数量较少。

从受教育水平分组看，硕士以上劳动力的求人倍率除了 2004 年第一季度外，在其它季度都是最高，说明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技能劳动力的岗位搜寻和匹配存在优势。如果对大学本科和初中及以下劳动力的求人倍率进行比较，2001 年大学本科劳动力求人倍率较高，初中及以下劳动力的求人倍率最低。但到 2004 年，经济增长引发的就业需求剧增，使得初中及以下劳动力的求人倍率上升到第二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出口高速增长和新一轮经济增长是引发民工荒现象的导火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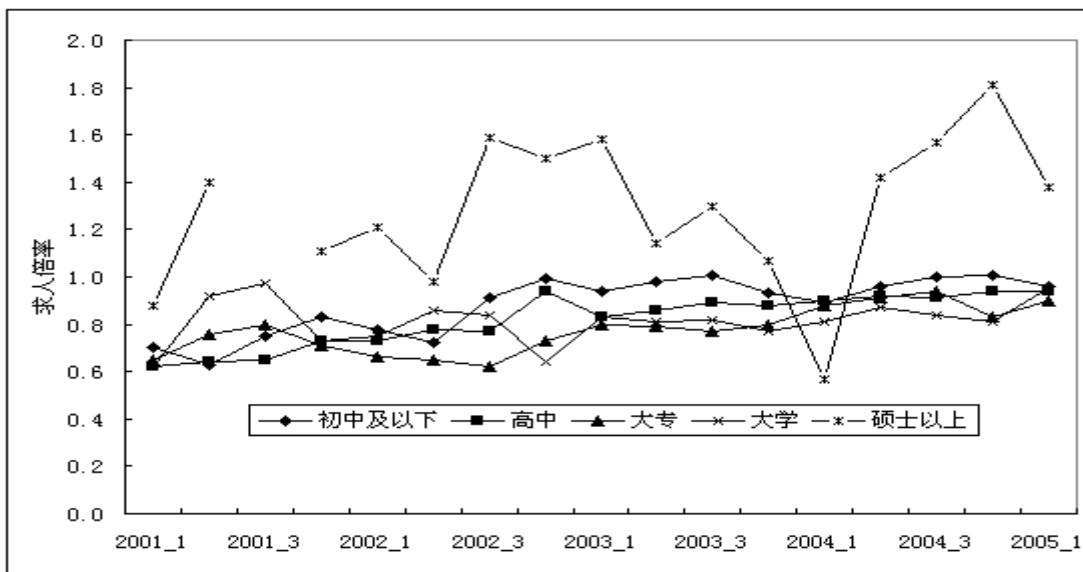


图 1 2001 年到 2005 年分季度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求人倍率

注：2001 年第三季度硕士以上的求人倍率为 5.09。由于异常，故略去。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中国劳动力市场网。

(二) 民工荒主要表现为区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

出口和制造业在沿海地区高度集中是该地区用工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表 2 可见，广东省出口贸易占全国总量的 1/3 以上，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占 1/3 以上，八个沿海省市出口比重为 83%、制造业就业比重接近全国的一半。细分产业的制造业产值和就业集中程度更高。例如，2003 年，上海、浙江、江苏的纺织工业产值占全国比重的 49.3%，就业比重占 35.8%；广东、福建两省的纺织工业产值比重为 13.3%，就业比重占 10.8%。在沿海地区的出口增长快于全国总出口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规模扩张加大了企业用工需求。

表 2 中国主要沿海省市的出口与制造业就业的比重、以及出口增长

地区	出口比重 (%)		制造业就业比重 (%)		出口增长 (%)		
	2004	2004	2004	2001	2002	2003	2004
北京	3.5	1.8	1.8	-1.5	7.0	33.9	21.8
天津	3.5	1.5	1.5	10.0	22.5	23.4	45.4
河北	1.6	7.0	7.0	6.6	16.1	29.0	57.6
上海	12.4	3.2	3.2	9.0	16.0	51.2	51.7
江苏	14.7	9.0	9.0	12.1	33.2	53.7	48.0
浙江	9.8	9.4	9.4	18.2	28.0	41.4	39.8
福建	5.0	3.9	3.9	7.9	24.7	21.7	39.1
广东	32.3	9.4	9.4	3.8	24.1	29.0	25.3
合计	82.7	45.2	45.2	7.2	23.6	36.2	36.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4)，《2005 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沿海地区制造业大多为“三来一补”企业，在长期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下，使得大规模接受订单时，企业并不为工资上涨留出利润空间。随着近两年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普遍上涨，如果工资水平再上涨，势必会大幅提高企业的劳动成本，减少企业利润。如果企业试图保持工资水平不变，企业就不能够雇佣过去同样数量的劳动力，维持原有的生产规模。为了维持原有的生产规模，企业只有通过提高工资才能雇佣原有的就业数量。由于企业调整生产结构有一定的时滞，在短期内难以采用资本替代劳动，缓解工资上涨压力，这样，这些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在所难免。

从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分布看，企业用工短缺对象主要是 20 岁到 30 岁的年青农民工、特别是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所需的女工，他（她）们都是在 80 年代前后出生。由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推开，与 70 年代初期相比，人口出生率到 70 年代末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幅度在 15% 以上。由于当初新生人口数量相对较少，经过 20 多年之后，这些组别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也相对较小（见图 2）。2003 年，20-24 岁年龄组人口比例只有 7.6%，比 15-19 岁年龄组低 1.6 个百分点；25-30 岁年龄组人口比例只有 7.4%，比 30-34 年龄组低 2.1 个百分点。当宏观经济形势好转，出口增长加大了这些行业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然而，由于 20 岁到 30 岁年龄段的人口相对比例较少，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供求结构之间的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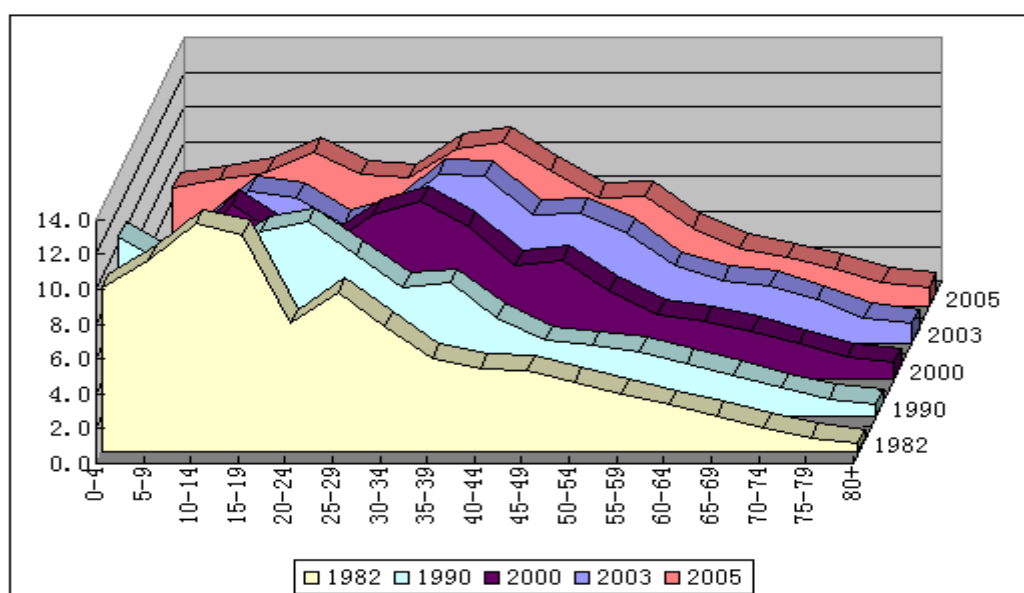


图 2 1982—2005 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分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1986），《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1993），《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2002），《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2005 年数据来自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2 Revision and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1 Revision（中位方案估计值）。

此外，来自餐饮、娱乐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就业需求上升，也加剧了沿海地区农民工短缺问题。随着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第三产业发展作为宏观经济形势好转的先导性标志，往往快于第二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发展扩大了对年青劳动力、特别是女性的需求。相比制造企业的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等特点，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上升减少了年青劳动力选择制造企业就业的意愿。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

近年来，粮价上涨、取消农业税和给予种粮补贴等农民收入支持政策，确实提高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如果外出打工收益不能补偿外出机会成本上升的部分，那么，农村劳动力的意愿供给数量就会出现下降。在非农就业工资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外出机会成本上升减少了农村劳动力的预期收益，降低了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降低，有可能造成农村劳动力外出数量下降，从而带来企业用工短缺问题。

但是，根据农业部固定观察点资料，农村外来劳动力不仅在总量是逐年上升的，而且增量上也是上升的（见表3）。1995年到1997年，受宏观经济增速放慢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年平均增幅在375万人左右。2001年到2004年，经济增长加快带来了外出增量上升，年平均在415万人左右。很显然，农业预期收益上升并没有减少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总量。

表3 1999—2003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和迁移

年份	出乡就业（万人）	年平均转移量（万人）	跨省迁移比例（%）
1993	6200	800	-
1995	7000	400	-
1996	7223	223	-
1997	7722	499	38.3
2001	8961	348	46.9
2002	9430	479	46.4
2003	9820	390	41.0
2004	10260	440	41.9

资料来源：农业部课题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问题及对策》，《农村经济文稿》2005年第5期。

相对收入变化也为我们判断农村劳动力外出数量是否减少提供了依据。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取决相对收益比较。即使在外出机会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如果外出打工的相对收益更高，那么，外出机会成本上升的影响就被抵消。用乡镇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农民收入比较，2000年到2003年两者之比基本稳定在2.5:1左右，相对收益没有变化，这也表明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关系没有改变，总量上不存在着短缺问题。

其实，用来解释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刘易斯模型有两个转折点（Lewis, 1954; Fei and Ranis, 1961）：第一个转折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有限剩余的转折点，第二个转折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有限剩余到被完全吸收的转折点。在第一个转折点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弹性为无限的，城市工业部门扩张不会面临着农村劳动力短缺问题。当越过第一个转折点之后，农村劳动力供给变得有一定弹性，如果企业在短期内工资调整不及时，就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用工困难。

从就业角度看，1991年是中国农业就业的历史转折点，此后，农业就业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1992年到1996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将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农业就业绝对数量的下降幅度每年平均在2.3个百分点，农业就业比例也从1991年的59.7%下降1997年的49.9%。这是建国以来农业就业比例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1998年到2002年，农业就业比例基本上维持在50%左右。2003年，农业就业比例进一步下降到49.1%。2004年，农业就业比例下降幅度最为显著，比上年下降了2.2个百分点，为46.9%。

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数量逐步减少。虽然

1997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1.5亿到1.7亿之间（刘建进，2003），相当于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0-35%，但2001年到2004年农村外出劳动力外出增量进一步上升，促使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供给特征发生了相应变化，即从过去的无限供给阶段转为有限剩余阶段。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进一步佐证：一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也出现过高速增长，但企业并没有遇到用工短缺问题。二是农民工的低工资水平在过去机会没有改变，但目前面临着上涨压力，如果绝对工资水平没有提高，这种区域性和局部性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就难以解决。

二、地区竞争与流动格局变化

农村劳动力从珠江三角洲地区向长江三角洲地区流动，反映了流动格局上的一个新变化。这种变化是劳动力市场对贸易自由化条件下中国经济重心转移所做出的调整和反映。在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地区之间竞争加速了生产要素流动，贸易和投资的空间分布变化，不仅在地区之间形成了多个经济增长中心，而且地区之间的就业机会差异也改变了劳动力的流动格局。

国家统计局2003年的数据显示，农村劳动力跨省比例为49.9%，将近70%的农村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由于统计口径和样本范围差异，来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跨省流动比例较小（见表3）。从趋势上看，2003年农村劳动力跨省比例比上年降幅为5.4个百分点。这可能在较大程度是受到了“非典”因素的影响。2004年，农村劳动力跨省比例比上年略有回升，为41.9%，但仍低于2002年的比例。这也表明，中西部地区经济崛起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让更多劳动力能够选择在省内就业，农村劳动力流动形成了跨区流动和就地转移同时并存的格局。

（一）经济重心的转移

按照地理区位和产业结构的相似性，我们把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划分为以下八类地区¹：即东北地区、华北沿海地区、黄河中游地区、华东沿海地区、华南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利用贸易和投资等指标，我们可以观察到经济重心转移对流动格局的影响。

开放度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它等于贸易总量占GDP总量的百分比。从表4可以看出，中国开放度从1990年代以来均呈现上升趋势，这种趋势在2001年以后进一步加强，但在地区之间有显著差别。以2001年为基期，八类地区中华东沿海地区开放度上升最快，余下依次是华南沿海地区、西北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

加入WTO之后所带来的内外市场相互开放，如享受国民待遇和扩大市场准入份额等，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条件，使得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地区间贸易格局的重新调整。从表4可见，1990年代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约占全国对外贸易的八成以上。如果把各个地区贸易额占全国的比重称为贸易集中度，那么，在三个沿海地区中，华东沿海地区迅速提高，贸易集中度由1990年的15.6%提高到2004年的37.8%；华南沿海地区大幅下降，由1992年的53.2%下降到2004年的37.5%；华北沿海地区先升后

¹ 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华北沿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黄河中游地区：内蒙古、山西、河南、陕西；华东沿海地区：上海、浙江、江苏；华南沿海地区：福建、广东、海南、广西；长江中游地区：安徽、江西、湖南、湖北；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南地区：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

降，2004年为14.2%。这表明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从过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向长江三角洲地区转移。

表 4 1992-2004 年地区间贸易格局变化

	开放度 (%)			贸易集中度 (%)		
	1990	2000	2004	1990	2000	2004
东北地区	19.4	20.9	26.3	9.9	5.2	4.4
华北沿海地区	15.6	45.2	40.9	11.6	20.5	14.2
黄河中游地区	5.9	7.4	9.2	2.9	1.8	1.7
华东沿海地区	22.0	55.3	101.0	15.6	27.0	37.8
华南沿海地区	90.3	99.8	130.4	53.2	41.0	37.5
长江中部地区	6.3	6.8	9.4	3.9	2.3	2.1
西北地区	5.6	9.9	15.7	0.9	0.7	0.8
西南地区	4.6	6.6	9.6	2.0	1.5	1.5
全国	30.0	43.9	7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1），《2005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地区间贸易格局变化反映了产品流向上的变化，这种改变来自生产和投资的地区间转移和空间集聚。一般而言，产品和资本具有较高的流动性。随着地区间相对优势变化，资本会从预期收益较低的地区流出，流向预期收益相对较高的地区。资本流动带来了投资转移，从而使得投资集中度在地理空间分布发生变化。

表 5 1992-2004 年地区间投资格局变化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集中度 (%)			国有固定资产投资集中度 (%)			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度 (%)		
	1990	2000	2004	1990	2000	2003	1990	2000	2004
东北地区	11.4	8.5	8.2	15.1	9.2	8.1	9.1	6.7	9.7
华北沿海地区	18.6	19.6	20.2	19.1	19.3	17.3	15.8	16.1	23.8
黄河中游地区	11.5	9.4	11.3	11.0	11.3	12.9	2.1	2.9	1.6
华东沿海地区	20.4	21.3	22.1	14.6	18.2	19.9	10.9	27.8	34.1
华南沿海地区	14.8	15.8	13.4	15.9	13.3	11.8	59.4	38.8	20.1
长江中部地区	10.6	11.5	11.5	9.9	12.8	12.9	1.8	5.4	9.2
西北地区	4.3	4.1	3.7	5.4	5.1	5.5	0.2	0.2	0.2
西南地区	8.4	9.8	9.6	9.0	10.8	11.6	0.7	2.1	1.3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1），《2005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看（见表5），2004年集中度列前三位的分别是华东沿海地区、华北沿海地区和华南沿海地区，三者合计占全国比重54%，余下五类地区占全国比重只有46%。从趋势上看，华南沿海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集中度呈现下降趋势，而其它五类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集中度程度不同地呈现上升趋势。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比重约占40%，外商直接投资（包括来自港澳台的投资

资)比重接近 10%，因此，上述地区间投资集中度变化的较大部分可用国有经济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变化来解释。

从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来看，1990 年到 2003 年，华东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西北地区的集中度上升，而东北地区、华北沿海地区、华南沿海地区的集中度下降。中国在 90 年代提出的西部大开发计划，通过向西部地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确实对提高西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有一定贡献。

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度变化所反映投资转移趋势更加明显。在 90 年代初期，接近 60% 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华南沿海地区，但是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投资收益下降，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向长江三角洲地区集中。1990 年到 2004 年，华东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度上升了 23.2 个百分点，而华南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集中度下降了 39.3 个百分点。长江流域的中游地区和西南地区也分别上升了 7.4%、0.6%。以长江流域为标志，中国经济形成了一条新的增长带。

(二) 就业创造与流动格局变化

改革以来，沿海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领先区域，但随着时间推移，沿海地区内部的领先角色发生了变化。从大的背景角度看，80 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率先改革开放，使得华南沿海在整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上半期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先行地区。从 90 年代开始，长江三角洲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得华东沿海地区逐步取代华南沿海地区，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先行地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形成的全面对外开放，通过投资转移和投资集中，在地区之间形成了多个经济增长中心，共同引领着中国未来经济增长。

从表 6 可见，在 90 年代上半期，华南沿海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再次是华东沿海地区，最后是华北沿海地区。到 90 年代下半期，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接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华东沿海地区成为沿海地区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其次是华北沿海地区，最后是华南沿海地区。

表 6 1990—2004 年分地区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 (%)

	GDP 年均增长			非农就业年均增长	
	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3	1995-2000	2000-2003
东北地区	9.7	8.9	10.0	-4.1	-0.2
华北沿海地区	14.6	10.9	11.3	0.3	3.9
黄河中游地区	11.2	9.7	10.5	0.6	3.0
华东沿海地区	16.8	11.2	11.9	-0.5	6.0
华南沿海地区	18.6	10.4	11.1	1.2	3.9
长江中部地区	12.9	10.3	9.4	0.4	3.1
西北地区	10.1	8.7	9.7	0.2	4.8
西南地区	10.7	8.9	9.7	2.4	4.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进一步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比较发现(见表 6)，90 年代中期以来，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差距不大，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大多数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 90 年代下半期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贸易扩大和投资增长推动的地区间共同经济增长，改变了 90 年代中后期国内需求疲软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经济追赶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均衡，通过就业创造带来了地区间就业机会分布差异。

表 6 数据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归为非农就业，结果表明非农就业机会分布确实对劳动力流向变化有重要影响。从 1995 年到 2000 年，沿海地区中基本上只有华南沿海地区起到拉动就业增长的积极作用，而华北沿海地区和华东沿海地区均出现了就业负向增长。进入 2001 年到 2003 年，三类沿海地区的非农就业增长均为正值，其中以华东沿海地区增长最快，其次是华北沿海地区，最后是华南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的就业增长趋势也基本相似。2001 年到 2003 年内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拉动了就业相应增长。在地区间相对工资水平改变不大、而就业机会不同程度增加的情况下，不同区域的劳动力市场问题就通过全国劳动力市场传递和反映出来，引导着农村劳动力流动格局变化。

三、劳动力流动与产业梯度转移

民工荒现象反映了两个趋势：一是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加强，二是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加强。这种新趋势表明，中国比较优势发挥与劳动力市场发育深刻地交织在一起。随着扩大对外开放，贸易自由化要求中国地区间产业结构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和专业化分工要求，合理配置要素资源。反过来，只有在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前提下，这种结构性和区域性的劳动力市场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在市场相互开放过程中，中国制造业能否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竞争优势，取决于中国制造业劳动成本的相对优势状况、劳动成本的上升幅度、以及国内产业结构在地区间转移和调整速度。如果劳动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能够通过地区间产业结构梯度转换来化解，那么，中国制造业的劳动成本优势将会继续保持。

（一）中国制造业劳动成本的国际比较

劳动成本优势是保持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给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下，劳动力成本与企业利润（资本回报）是一种反向比例关系。由于产品市场通常是完全竞争的，制造企业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无法去影响市场价格。这样，劳动力成本高低对企业的投资回报有重要影响。劳动力成本越低，投资回报越高。反之，劳动力成本越高，投资回报越低。

表 7 1995—2002 年制造业年平均工资的国际比较（美元）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中国	619	679	716	853	941	1057	1181	1329
日本	35569	31296	28485	26547	30667	32638	29376	28366
美国	25667	26520	27331	27976	28808	29786	30701	31803
英国	25997	26902	29319	31588	32139	31345	31530	34412
韩国	17486	18813	16729	10999	14894	16993	15824	17812
新加坡	18264	19740	20097	19474	19844	21132	20876	21137
马来西亚	4801	5318	5161			4383	4835	
印度	434	402	367	345	429	336		

注：（1）本表利用各国对美元当年汇率将制造业年平均工资换算成美元；（2）由于各国工资统计存在差异，美国、英国的小时工资按照 52 周、每周 40 个小时转换成年平均工资，其它国家的月工资按照 12 个月转换成年平均工资。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http://laborsta.ilo.org/>。

表 7 利用国际劳工组织（ILO）统计数据比较了制造业工资成本。相比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具有绝对优势。但从动态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工资增长较快，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成本相对优势在不断缩小。1995 年到 2002 年，中国制造业工资年平均增长率为 11.6%，日本为-2.8%，美国为 3.1%，英国为 4.3%，韩国为 2.5%，新加坡为 2.2%，香港为 3.3%。由于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绝对优势非常明显，即使考虑到工资增长因素，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在较长时期内继续保持。

但是，如果考虑中国周边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泰国、越南等，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将受到挑战。表 7 中显示，印度制造业的工资成本 1995 年只相当于中国的 70%，而且这种差距在不断扩大。中国相对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工资成本不是很高。随着中国周边国家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增加，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环境竞争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如果中国制造业的劳动成本进一步提高，工业制品的出口竞争优势必然被削弱。

（二）中国产业梯度转移的可能性

从产业政策角度看，民工荒现象把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进一步凸现出来。随着劳动成本上升，劳动力相对资本将变得更加昂贵，市场竞争迫使各个地区根据自身优势来调整产业结构或进行产业升级。不断上升的生产专业化趋势，也表明中国制造业面对国际竞争在进行结构调整。

劳动力集中指数是反映专业化水平的一个指标，该指数的离散程度可用来观察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状况。如果各地具有相似的就业结构，那么，劳动力集中指数的均方差²就为零。反之，它就大于零。如果均方差趋于上升，则意味着地区间就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蔡昉等（2002）利用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制造业就业数据计算显示，均方差数值虽然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急剧下降，但从 1992 年以来也呈快速上升趋势，由 0.29 上升到 2000 年的 0.59。这表明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地区间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从劳动成本和盈利性角度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需要一定的条件。纺织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它也是中国制造业中就业数量最多的行业。在沿海地区面临劳动成本上升压力的情况下，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能否向内陆地区转移将取决于它的劳动成本优势和盈利前景。

从表 8 的数据看，内陆地区的工资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亏损企业比例相对较高、企业利润率相对较低。相比之下，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省市制造业的利润率较高、亏损企业比例相对较低。在沿海发达省市中，广东、北京的制造业利润率较低、亏损企业比例较高。

将劳动力生产率除以平均工资水平，可计算地区间的相对优势系数。计算结果表明，沿海地区仍保持一定的相对优势。例如，河北、江苏、山东、海南等沿海省市的相对优势系数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不过，也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迹象。例如，内蒙古、湖北、宁夏的相对优势系数接近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将相对优势系数与成本利润率、企业平均规模联系在一起观察，可以发现，纺织企业

²离差计算分为绝对离差和均方差两个公式。绝对离差为： $\sum_i \sum_j |S_{ij} - S_j|$ ，均方差为： $\sum_i \sum_j (S_{ij} - S_j)^2$ 。

S_{ij} 为 i 省 j 行业中的劳动力数量占制造业劳动力数量的份额， S_j 为 j 行业中的劳动力数量占全国制造业劳动力数量的份额。

的盈利能力与企业的平均规模有较大的相关性。例如，宁夏的企业平均规模排在首位，它的相对优势系数和成本利润率排在第一位。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浙江省的企业平均规模最大，亏损企业比例，企业的成本利润率最高。

解决中西部地区制造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体制落后等方面问题，是推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的关键。从长远来看，如果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盈利性得到改善，那么，劳动成本上升对中国制造业所带来的影响，就能够通过地区间产业结构梯度转换来化解，从而继续保持中国制造业的劳动成本优势。

表 8 中国纺织业的地区间相对优势

地 区	平均企业规模 万元	亏损企业比例 %	成本利润率 %	平均工资率 元	劳动生产率 元/人	相对优势系数
全国	47.0	18.6	2.7	8079	38198.2	4.7
北京	39.0	25.0	-0.1	11505	35237.0	3.1
天津	22.3	42.8	4.0	10056	22324.6	2.2
河北	48.8	12.5	4.3	6890	32359.9	4.7
山西	39.6	31.0	-3.1	5056	14833.3	2.9
内蒙古	97.4	19.0	3.3	7386	56451.6	7.6
辽宁	36.7	40.1	1.7	5933	23507.2	4.0
吉林	52.9	31.1	-1.0	5242	21309.2	4.1
黑龙江	43.1	28.6	1.4	7152	18455.4	2.6
上海	32.2	20.9	2.4	14649	41912.0	2.9
江苏	44.5	17.0	2.3	9211	48851.4	5.3
浙江	55.2	9.4	3.7	11577	48072.2	4.2
安徽	38.4	37.1	0.3	6502	25563.9	3.9
福建	42.8	16.8	4.3	11281	45032.6	4.0
江西	24.4	25.2	1.8	6837	22323.0	3.3
山东	61.0	12.0	4.6	7574	40803.9	5.4
河南	36.5	19.2	2.2	6735	25371.4	3.8
湖北	42.9	21.2	0.8	6240	29600.5	4.7
湖南	30.2	30.3	0.0	6366	21388.0	3.4
广东	49.8	23.8	1.0	10681	48004.7	4.5
广西	31.9	45.6	-0.2	6969	17527.8	2.5
海南	84.4	42.9	2.2	9943	61304.3	6.2
重庆	40.1	28.7	-1.7	6797	14083.7	2.1
四川	37.4	24.4	1.4	6672	21137.1	3.2
贵州	17.5	43.5	-6.6	5960	8000.0	1.3
云南	19.6	50.0	-9.0	6944	7696.3	1.1
陕西	52.0	55.3	-4.7	7657	14574.7	1.9
甘肃	18.2	29.9	-1.7	6632	20149.3	3.0
青海	18.3	25.0	-0.9	6132	26451.6	4.3
宁夏	97.8	6.3	5.2	10037	148958.3	14.8
新疆	48.6	51.4	-5.1	7642	19751.5	2.6

注：（1）成本利润率为 2004 年 4 月到 2005 年 5 月的月度平均值，资料来自中经网；（2）相对优势系数等于劳动生产率除以平均工资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4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 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三）劳动力市场效率与产业转移

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对产业结构调整或产业转移都具有重要意义。从就业角度看，劳动力市场效率来自流动效率和匹配效率两个方面。流动性是保持劳动力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如果劳动力市场存在体制和政策等限制因素，受其影响，劳动力流动性会降低。同时，如果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不畅，工资信号就失去了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调节作用。

利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提供的制造业工资数据，都阳和蔡昉（2004）证实中国地区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不断上升，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在空间匹配过程中，保障畅通的信息流动对解决局部的和相对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变得非常重要。然而，由于户籍制度存在，中国农村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形成了地理上的割裂，即供给方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而需求方在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短期变动信息不能及时传递，任何一方都难以及时调整以适应另一方发生的不期变动，这加大了劳动力市场波动。

可以设想，在给定工资水平的条件下，出口和增长扩大了沿海地区对农村劳动力的用工需求，但由于流动性和匹配性上的限制，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及时流出，造成了短期内劳动力供给刚性，企业在给定工资水平下的用工需求得不到满足，也就产生了短缺问题。如果企业提高工资，由于短期内劳动力供给刚性，新增的劳动需求不仅没有满足，而且由于工资上升仅仅是提高了在岗工人的工资，这样，也就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降低了企业利润。

如果劳动力市场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是统一的、灵活的、有效的，那么，农村劳动力供给就具有一定的弹性。当出口和增长在沿海地区产生了新的劳动需求，只要中西部地区和农村还有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就会从农村转移出来，流向沿海地区，满足这些地区新增的用工需求。

当然，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不可能是充分完善的。由于年龄结构原因，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壮年和女性劳动力跨区流动性相对较小。这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通过就地转移方式从事非农就业。从要素市场角度看，劳动成本不是决定产业空间分布的唯一因素。中西部地区相对低廉的土地价格，也为沿海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转移提供了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和效率对完成产业转移就变得非常重要。

四、政策含义

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表明，过去依靠本地化的劳动力市场来解决供求问题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需要通过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空间匹配来把有限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发掘出来，解决不断扩大的劳动需求。同时，地区之间争夺劳动力资源的市场竞争也会越演越烈。谁是胜者，将取决于本地劳动力市场开放程度和就业制度改革所提供的吸引力。在这种新形势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将有助于提高全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水平及其效率。

（一）加快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 and 地区间产业转移，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要求加强整合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劳动力资源，这样，农村劳动力转移就通过劳动力市场将城乡就业问题融合在一起。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劳动力需求问题，也要关注劳动力供给问题，把农村就业和城市就业一并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长远规划，统筹安排。

加强就业信息体系和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是做好劳动力供求调节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要掌握不同区域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外出意向、迁移数量和流向；另一方面，要了解沿海地区和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用人需求。通过就业信息体系和服务体系，把不同区域和城乡之间的劳动力供求状况进行有效衔接，就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形势，对劳动力市场及时做出相应调整，保持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相对稳定。

（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由于以户籍制度核心的一系列制度性障碍仍然存在，农民工在行业进入、岗位获得、工资报酬、社会保障和福利、工作条件、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仍然受到歧视性对待，制约着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应着眼于剥离户口的福利含义，即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就业、居住、教育、社会保障和福利等各项权利，将就业权利与户籍制度彻底脱钩，为劳动力自由流动扫清制度障碍。从制度设计角度看，应鼓励各地开展农村劳动力平等就业试点改革，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把农民工的就业、居住、劳动保护、社会保障、教育等问题纳入输入地政府管理范围，探索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和就业的途径。

（三）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素质和技能培训

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政府要把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培养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与统筹城乡就业一道，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长远计划。通过加大财政投入，提高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工作的扶持力度。

其次，做好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通过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落实“2003至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抓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项目等措施，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在职业教育培训中，推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并重制度，促进职业教育与就业相结合。

（四）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农村转移劳动力在迁移动机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年青群体更加关注个人发展机会，除了工资待遇外，对就业环境、条件和稳定性也有要求，这样，他（她）们的流动性较高。较高的流动性不可避免地带来劳资双方摩擦。特别是，农民工在劳动合同、工资支付、社会保障等方面缺乏有效的法律和执法保护，如果劳资双方摩擦没有很好的渠道加以解决，也有可能引发冲突和社会不安定。

从长远来看，制度建设是确保劳动力市场高效运行的关键措施。一是加强保护劳动者的立法和执法，建立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二是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为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提供制度基础。三是深化工会制度改革和完善工资形成机制，为劳动力平稳有效地运作提供一个制度平台。

参考文献:

蔡昉、王德文、王美艳, 2002: 《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地区专业化趋势》, 《经济研究》第9期, 第24—30页。

都阳、蔡昉, 2004: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进程: 制造业工资收敛的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工作论文 No.40。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 2004: 《劳动问题专家破解“民工荒”、“技工荒”》, 《经济参考报》2004年9月9日。

刘建进, 2003: 《农村就业》, 莫荣编《2002年中国就业报告》,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 北京。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4), 《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1986),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1993),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2002),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4), 《2005年中国统计摘要》, 中国统计出版社, 北京。

Fei, J., and Ranis, G., 1965.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No.4, 76-106.

Lewis, W. Arthur.,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2(May), 139 - 191.

Solinger, Dorothy J., 1999. Citizenship Issues in China's Internal Migration: Comparisons with Germany and Japa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4, No.3: 455-78.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2 Revision and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1 Revision*.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l Labor Mobility in China: New Trend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WANG Dewen CAI Fang GAO Wenshu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shortage of rural migrants is a response of labor market to rapid export expansion, a new-round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hift of economic concentration after China became a WTO member. It not only indicates a transition of China's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s from unlimited supply to limited surplus, but also points out that solving structural issues of local labor markets needs the integration into the national labor market. It is possible for China to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f increasing labor cost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industry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Deepening Hukou system reform and speeding-up the construction of labor market system has very important implications to the mo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China's labor market.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Shortage of Rural Migrants, Labor Mobility, Economic Concentration